

另一面

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

张宏杰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另

一面

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

张宏杰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张宏杰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5306-3758-4

I. 另… II. 张… III. 历史人物—列传—中国—
古代 IV. K8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776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2 字数 267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7001 - 12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序

当历史扑面而来

莫言

张宏杰的笔总是能如此轻松地割开时间帷幕，让那些本来离我们极其遥远的历史人物的气息甚至体温扑面而来：

吴三桂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处世能力。他属于多血质类型，社会协调性极强，善于感知别人的情绪反应。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镇定自若，在战场上，他表现出的勇气和沉着使他赢得所有军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场合，他的沉稳风度使他永远成为人群中心。……虽然年纪轻轻，又是名门之后，可他身上见不到一点纨绔之气，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从无疾言厉色。

写历史人物就像写自己身边一个极熟悉的朋友，这种笔法本身就是一种能力。或者说，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张宏杰的作品之所以呈现出一些特别之处，原因就在这里。

张宏杰不是从政治、道德或者学术的角度，而仅仅是从人性的角度去接近古人。他不批判也不仰视，他只是抱着悲悯之心，替他笔下的人物设身处地，悲欢与共。也仅仅因为此，那些在历代史书中伟大或者邪恶得光怪陆离的历史人物被他还原成了可以信赖的人，与以往的描述面貌迥然不同。

比如说，在我们心目中汉奸的代名词“吴三桂”三个字，经过他的笔墨滋润，一变而成了一个“外表兼具北雄南秀”的美男子，一个在战场上冷静坚决、无与伦比的战士，一个曾经视荣誉如生命的忠臣孝子，一个在历史夹缝中被挤压被扭曲的痛苦灵魂。

再比如，那个历来被认为凶险、狡诈、处心积虑的大太监魏忠贤，在剥去历代史家的层层曲解之后，在他的笔下剩下的的是一个憨厚粗朴、待人真诚的“傻子”。这个“傻子”原本胸无大志，素来在太监中被欺负被嘲弄，直到五十二岁了还仅仅满足于做一个“伙食管理员”。谁承想机缘巧合命运捉弄，他居然被颠簸到大明王朝权力结构的最高点进行了一番手忙脚乱漏洞百出的表演。

至于那个被骂了近两千年的王莽，张宏杰却认为他是个标准的先进模范。甚至他最后当皇帝也有点“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献身精神。王莽同志确实把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了国家，可惜他的鞠躬尽瘁，换来的是身败名裂。

这些结论真是触目惊心，但过程却是层层深入的。张宏杰不是刻意地翻哪个人的案，他只是把这些历史名人所做的那些匪夷所思的伟大或者邪恶的事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用人情伦理的平常心去推理，结果却是顺理成章，让我们感觉到如果我们生在那个时代，也许我们也不得不如明武宗那样荒唐，或者如吴三

桂那样无情。这些大伟人或者大恶人，其实都是命运之流中苦苦挣扎的可怜人，和你我一样。在阅读中，你不得 not 和他们一起痛苦、战栗和呻吟。在河北保定的军营中，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培养起了对历史书籍的阅读兴趣，但是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很少读到什么历史读物能像张宏杰的这些作品一样给我带来这样大的阅读快感。

把这些作品归到某种文学体裁，是件挺困难的事。这些东西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也不是时下流行的历史报告文学，甚至还不是人物传记。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东西都流露着天然的文学品质，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对人性和命运的关心。借用张宏杰自己的一句话，“关心历史其实是关心自己”，他对这些古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兴趣里，无疑包含了对自己的兴趣。张宏杰解读古人就如同解读自己，既小心翼翼又深入彻骨。

这本书，如果起个副标题的话，我建议叫做“人性实验观察记录”。“人是太复杂的一种动物，其复杂程度有时让人类自己也瞠目结舌”（张宏杰语）。我相信，张宏杰对人性的复杂一定有着科学家般的浓厚兴趣。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不会有太多的大风大浪，不会有太多的悲欢离合，体验到的和经历过的事毕竟有限。即使是最杰出的小说家，想像力也只能在经验的边界里飞翔。因此，人性的侧面在现实中表现得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在历史这个壮观的剧场里，人性却有机会表现它平庸生活中难得展示的一面。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各样出人意料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改朝换代、家破人亡、非同寻常的诱惑与考验、传奇般的危机和奇遇。在张宏杰的这本书里，好像上帝为了分析出人性的每一种成分，他老人家进行了千奇百怪的实验：他把个性色彩反差极大的吴三桂、钱谦益、龚鼎孳一起放到明清易代的大背景下，看着他们不同的人格结构在共同的历史重压下如何抵抗、伸缩、变形、扭曲、断裂。他把洪秀全、魏忠贤这样天资平庸的人推向社会制高

点,看他们在这个让人眩晕的高度上如何忘乎所以、丑态百出。他把王莽、海瑞、曾国藩这样的道学先生放到纷纭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去,看他们相同的坚定顽强和不同的下场。任何一个小说家极尽想像力,也写不出这样精彩的剧本。这些剧目对七十年代生人张宏杰来说是如此具有吸引力,所以他循着对自己性格和命运的关心闻声而来,来到了这里,做了这冷清剧场内的一个有心的看客。

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地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让我们这些历史书页背后的观赏者触目惊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当历史扑面而来,我们只好在造物者的深刻面前一再确认自己的浅薄。

目录

001 当历史扑面而来(序) 莫言

另类传记

- 001 无处收留:吴三桂的心理传记
045 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魏忠贤
077 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王莽
114 偏执症患者:海瑞
156 问题皇帝:正德的生活史
192 权力的奥秘:朱棣研究
222 心不在焉的革命者:洪秀全
243 最成功的农民:为朱元璋画像

人物随笔

- 263 神女生涯
277 回首爱新觉罗们

目录

- 299 女人慈禧
- 306 曾国藩
- 321 一九一三年前后的袁世凯
- 336 为患者朱元璋做的心理咨询
- 评论
- 356 人的历史 祝勇
- 359 走向开放的历史大视野 李少君
- 363 后记

无处收留： 吴三桂的心理传记

把吴三桂从繁体字的杂乱掩埋下发掘出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当我的目光一层层刷去吴三桂躯体上的泥尘之后，当他的灵魂像兵马俑一样艰难地从黄土中展现轮廓的时候，我的心便和他的灵魂一起痛苦地痉挛了。这些考古家手中的珍物啊，当他们走过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有着和我们异样，然而又能共通的悲欢。那欢乐，是千锤百炼后的抵达和黑夜掩盖下的放松；是曲曲折折的释放和矫揉造作的皈依。而那痛苦，却是巨大张力下的血淋淋的撕裂与麻木，是浓黑的夜的泪水。这种泪水，可以毒杀任何一种生物，只要它是上帝所创造。

无论如何，陈迹已经腐败，又通过树的汲取，进入我们的躯

体。无论如何,这一派风景已经在历史上写下,能否观赏要看我们的悟性。

公元一六四二年,明崇祯十五年,吴三桂三十一岁。这是一生中最挺拔亮丽的年华。就在这一年,他第一次面对了从未经历的精神重压。

这年三月,明朝和满洲之间的最后一次关键性战役——松锦之战尘埃落定。明朝辽东经略洪承畴的十三万大军土崩瓦解,锦州陷落,洪承畴被俘。大明王朝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宁锦防线终于被撕破。宁远,成了大明朝在山海关外的最后一座堡垒。

三十一岁的吴三桂继洪承畴之后统率辽东兵马,成了宁远城的最高军事长官,成了明帝国风头最劲的将领,也第一次成了明清两朝大角斗中的焦点人物。崇祯皇帝和皇太极的目光分别从北京和盛京投过来,聚焦在他身上。来自东西两边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关系的压力和吸力揉撕着他。西面,是前途黯淡的祖国和家园。那里正处在分崩离析前夜的紧张慌乱之中,幸亏山海关那高大厚实的城墙把饥民的呻吟和叛军的呐喊声严严实实地挡住,让他享受片刻清静。而东面,三百五十年前,坦荡而蛮荒的辽东平原上,尖声嚎叫着满洲人潮水般一波比一波汹涌地扑来,冲刷得宁远城摇摇欲坠。

越来越多的人投向满洲,像洪水浸泡下不断崩塌的堤石。其中包括吴三桂的三位舅舅,赫赫有名的祖氏三大将。这座宁远城原本是他们把守。祖氏三兄弟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祖逖,那个志在恢复中原的东晋英雄。他们在辽东建立了自己的功业,并且相继栽培和提拔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及吴三桂本人。不过,现在,他们不再提及自己那位著名的祖先,他们写来亲笔信,替满洲人

劝降。这些信件娓娓说明，饥荒和寇贼的侵蚀下，大明朝千疮百孔，气数已尽，识时务者为俊杰。随信而来的，还有皇太极的敕书，那上面写明，满洲人许诺给吴三桂的官职远比崇祯皇帝给的高。

可是，官职再高，毕竟是满洲人的。“投降”这个词，即使是在吴三桂脑海里转一下，也火辣辣的烫得他的神经不舒服。他吴三桂，怎么能和叛变投降联系在一起呢？

自视颇高的他无法接纳这个肮脏的字眼。天朝和异族，从来是两个相互消解的世界。从你的敌人那里得到的越多，标志着你丧失的越多。满洲人给他的地位再显赫，也无法抵偿投降使他付出的人格代价和名誉损失。如果那样，他将日夜承受社会舆论造成的心灵重压。

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漫漶而无序的世界截然不同，穿过三百五十年的时空，在关东这片土地上（那时候，这片土地上到处覆盖着不修边幅的森林和无边无际的野草。人类只是在这野蛮豪放的土地的胸膛上，侵蚀出几小块难看的疤痕，作为城市和屯田。整个情景就像皮肤病初起时的症状），放眼四望，所见到的世界却是清晰、坚固、完整的。那是三百五十年前的先人们心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来有源去有迹，结构严谨，雄伟壮丽，一目了然。这个世界由儒家的伦理纲常所支撑，几千年来不断有智者为其修补加固，使其成为一处绝好的精神家园。每个人一出生就已被规定了生存的理由和目的，每个灵魂都可以在这个宏大坚固的庇护下安全而慵懒地憩息。这些灵魂都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刀剑相逼，不会另寻他路。

在这个世界里，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你的生命是祖先的恩赐，它附属于父母和家族。所以，一个人生存的目的，乃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光大家族的基业，延续家族的血统，使之不致断绝。这种责任重于个人的生命利益。这种思维大而广之，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家族，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

血缘关系的扩展。皇帝就是全社会的家长，他因上天的授权而享有至高无上的宗主权，普天之下的一切都被标上皇家的产权，阳光雨露都是皇家的恩典。恩命、恩旨、恩诏、恩赐、恩赏、恩赦、恩准、恩科、恩除、恩俸。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社会成员的一切行为，必须基于两条基本准则，那就是对皇帝的“忠”和对家长的“孝”。这是协调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宝，如果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把这两种品质充分发扬光大，一切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治理天下的要诀即是充分培养鼓励人们的忠孝品质。一个朝代如果覆亡，那么，作为本朝恩典的主要享受者的社会上层成员（包括官员和士人）就有义务为他的恩主尽忠殉国（这是光荣的选择），至少也应归隐山林，不再为新王朝服务（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在某种意义上，“忠”和“孝”已经脱离道德规范的范畴，而上升到价值本体的层面。叛徒、投降者、贰臣，他们背叛的不仅是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整个世界。他们注定要被世界所抛弃。

翻检图书馆里整架整架发黄的史书之时，我惊异于历朝历代忠臣烈士的数量，他们总是于王朝板荡之际集中出现，史书作者总是不得不为他们那些近乎雷同的事迹留出大量篇幅。他们中的多数是在并无切身危险的情况下安然自裁，有的还同时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甚至于贴身仆人。常常是阖门自焚。他们用这种残酷的自杀方式为自己的精神生存赢得空间，并因此获得精神上的自足感。这是他们完成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使命的最完美选择。

吴三桂似乎比别人更有理由效忠于大明朝。

吴三桂是大明朝朝野闻名的孝子良臣。他甚至可称得上是这个世界的道德楷模。这起因于一件意外事件。

那是天启末年的事。那一年吴三桂刚刚十六岁，还是个半大孩子，正在舅舅祖大寿的指导下学习武艺，父亲吴襄是祖大寿手下的一个总兵官。那一日吴襄带领五百名士兵出锦州城巡逻，在辽西荒凉的白山黑水间例行每天的公事。不过，这一次事出偶然，

在城外几十里处，吴襄和皇太极率领的四万满洲兵遭遇。皇太极为什么带领如此庞大的军队出现在这里史书中未有明确记载，不过吴襄的境遇却可想而知。吴襄急忙撤退，但是在锦州城几里之外还是被如狼似虎的满洲兵团团包围。吴襄带领这五百人左冲右突，无济于事，全军覆没看来是惟一可能的结果。

祖大寿闻讯带着外甥吴三桂登上城楼观战。两人都心急如焚，吴三桂一遍遍催促舅舅发兵救援。可是锦州城里只有三千守兵，坚守尚且不足，何谈出城救援。无奈之下，祖大寿只好硬起心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

我们无法确知十六岁的少年吴三桂的心理感受，无法确知他的举动是出于父子情深（吴三桂和父亲的感情真的很好，这在那时是并不多见的情形）还是少年人的热血冲动，总之，在祖大寿未加注意的情况下，少年吴三桂带领二十名家丁驰出城门，杀入了四万满洲兵的重围之中。

皇太极此时想诱明军出战，但是这二十多人的队伍却大出他的意料，这个精明雄武的满洲首领不知道明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少年吴三桂此时把生死置之度外，凭着一股血气，带领着二十多名家丁，居然如入无人之境，杀到父亲身边，把吴襄从目瞪口呆的满洲兵中带了出来。皇太极怀疑明军有诈，下令兵丁不要追杀，听任吴三桂父子逸去。

这个传奇性的遭遇给吴三桂带来的是一生受用不尽的声誉资本。在文恬武嬉的大明王朝，这个十几岁的孩子的孝勇之举立刻遍闻天下。连皇太极也对这个后生赞不绝口，称他为“好汉子”，并不无遗憾地说：“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

在以德治天下的社会，对人的道德自觉非常重视。父子人伦，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从一个人对父母的态度，可以推断他对他人对国家的态度。“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就成了当然的逻辑。当吴三桂带着一身血水汗水杀回锦州城之后，祖大寿对他说的第一句

话就是：

“儿不忧不富贵，吾即题请封拜。”

之后，吴三桂高中武举，再之后，仕途一路坦荡，年仅二十八岁时，就做到了镇守一方的宁远总兵，成为青年将领中的翘楚。在仕途的攀升过程中，他比谁都更深切地感受到道德资源对一个人社会成就的巨大推动作用。他十分珍重自己忠臣孝子的社会形象，他习惯于围绕这个形象设计自己的行动。他在父母面前恭谨体贴，他在朋友圈里轻财好士，他在百万军中英勇无双，他知道社会对他的角色期待，也尽心尽力地完善自己的社会角色。年仅三十一岁，他即已被破格提拔为辽东提督，总领关外军事，社会对他的回馈不可谓不厚。大明朝对他确实高恩厚德。

确切地分析吴三桂的选择中道义原则和现实利益的比重也许是不可能的。不过，最后的结果是明确的，他拒绝了舅舅的建议。此举很快就为朝廷所知，并进一步丰厚了他的道德资本。不过，从以后的叙述中我们便会得知，他的这一选择并不轻松。

二

大明朝就像一辆沿着下坡奔向悬崖的马车，所有的势能都指向一个万劫不复的终点。这些势能是此前的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它的最后一任驭手——崇祯皇帝竭尽心力的努力看起来更像一个苍白的手势，于事无补。相反，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垂死挣扎，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

大明朝的问题不在于遍地的水灾、旱灾、蝗灾，不在于四处蜂起的盗贼，也不在于几位奸臣或昏君。这些只是表象。在这一切的背后，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精神支柱已经腐烂了。

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那样重视名教纲常。半文盲皇帝朱元璋本质上是一个精明的、讲究实用的农民。他在马背上夺取

了天下，又以他那典型的农民式灵感发明了八股文，发明了《大诰》，发明了《皇明祖训》。他的努力指向一个方向：把天下人的头脑装进儒教纲常的保险箱，让社会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条之下永远平稳运转。

儒教的价值在明朝被张扬到了极致。孔子在明朝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每个读书人都必须死记硬背四书五经，每个乡村在朔望之日都必须集会听老人们宣讲圣道。这个朝代的读书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善于引经据典，这个朝代树起的贞节牌坊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每个年代，总有一批批大臣因为谏举皇帝不符祖训的行为，和皇帝据理力争较劲到底，被廷杖被流放被杀头光荣地登上忠臣榜。

可是也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后期那样，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空前低落，人们的精神生命空前萎缩，社会陷入严重的道德危机之中。

名教纲常的道德约束作用因为朱氏家族的透支使用而遭到严重损害。事实上，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的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它只有最高标准而没有最低标准。它也许能激起社会动荡时期的某种道德狂热，却不适宜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调节器。

在明朝以前，儒教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软约束发挥作用，而在明朝，这种软约束越来越硬化，这就使这一伦理标准陷入了困境。由于操作上的难度，它实际上成了一种“伪标准”。人们有充分的智慧来解决道德高压和自然欲望间的矛盾。他们一方面通过伪饰行为来装点门面，另一方面背地里则是心照不宣地沉沦在道德禁区里，享受矫枉过正的物质欲念的满足。道德价值的过分张扬的

最终结果却是整个价值体系的被削弱扭曲和人欲中卑劣丑恶一面的大放纵大宣泄。

随便举几个例证便可以把上述论证落到实处。嘉隆以来,整个明朝社会陷入奢靡淫纵之中,上至公卿士人下至平民百姓,每个阶层都沉陷于自然人性的放纵之中。在民间,金粉气息充斥于大街小巷,狎妓征歌之风遍及每个角落,街道上公然出售淫具春画。色情文学成为民间文学的主流。在社会上层,这种风气更为炽盛。宪宗成化年间,内阁首辅万安因进献房中术而得到宠信,朝中执掌风宪谏诤的大臣也居然争献媚药秘方。

有人说,十六、十七世纪是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阶段。这是一种善意的误解。明朝社会的晚期,人性的约束实际上固然已经废弛,但人们并没有公然宣称人的觉醒。人们生活在犯罪感中,虽然狂纵不羁,但是正统的社会价值依然是心中的认同。这只能导致人们精神的委顿,导致人们强烈的务实倾向,回避任何实质上的崇高。

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恐怕还是末代皇帝崇祯在诏书中亲口所说的: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如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征收钱粮先要克扣),完正额又欲羨余(国家规定之外又要私自征收)。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一有建设工程,就乘机中饱私囊)。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讞(判案)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不给贿赂),则敲扑任意;囊橐既足,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餍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